

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该问题的状况

约翰·迪利

按照通常的识见，如果说笛卡儿是十七世纪初的现代哲学之父，那么，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就是二十世纪初的符号学（semiology）之父，而查尔斯·皮尔斯则是与索绪尔同期的符号学（semiotics）之父。¹这样的勾勒可谓相当清晰。

但是，如果我们问：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程中，符号学对哲学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那么，在二十一世纪之初的回答只能是“相当有限”，除此之外的任何答案都有夸张之嫌。这种状况，按照我的解读，将会发生根本性变革。在现代后期的星光中，在所谓“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于英语和西班牙语学术领域中享有统治地位的不到一百年间，定期发行关于哲学规划的“期票”——通常是认识论性质的——已经成为习惯，却从来没有彻底兑现。当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在夜色中相继登临舞台，前者在星光中渐行渐远，后者则向着灿烂的黎明迈进，我想举出一个属于反向操作的不经意的例子。我不想从一通简单的规划说明转到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伟大事业，而是想要对一项已经完工的庞大工程做出摘要，²把当代符号学充分放置于作为整体的哲学史视野和语境之中，展现从它在古希腊爱奥尼亚³的源起到其新近成长为符号学——符号学说——整个历程。

当然，我关于哲学建制不再能够避免沿着符号学划出的路线重新装修自己的房子这种信念也许是错误的——但是，我已经太习惯于犯错误了，尤其是在做出预言方面，展望未来不会给我带来挫败感。这一次，无论对错，根据个人经验，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即便情况尤其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开始发生了变化，符号学一直以来是、现在也仍然是处于哲学的边缘地带。特别是分析哲学，在历经整个英语和西班牙语学术领域中哲学学术部门的所有主流范式的转换之后，对符号学

¹ semiology 和 semiotics 汉语中都译为“符号学”，前者为索绪尔所创，后者以皮尔斯为肇始，两者互有异同，具体可参见本书相关论述。鉴于作者多涉及皮尔斯，因此后文翻译中，对于前者一概采用明确标识，即翻译为“符号学（semiology）”，对于后者则不作明确标识，即一概径直翻译为“符号学”。——译者注

² 这里所谓“已经完工的工程”指这部上千页的巨著：《认识的四个时期：从古代到二十一世纪初哲学的首次后现代性通览》（*Four Ages of Understanding. The first postmodern survey of philosoph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oront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1）。本书中，凡此后提及此书，都将其书名统一简略为《四个时期》。本书可谓该巨著的精编本，是以我2000年12月在赫尔辛基大学所讲“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作为基础的，当时，我刚在那里担任完为时一个学期的符号学访问教授。

³ Ionia，爱奥尼亚：古代小亚细亚西部沿爱琴海海岸的一个地区。希腊人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在这儿建立了殖民地。——译者注

仍然是不接受的，尽管表面上你有望见到，哲学中就语言学视角的某个主张对于符号学观点是接受的，特别是当你考虑到二十世纪中对于符号的主流研究模式，即符号学（semiology），甚至对于总体的符号研究，也大肆强调语言学范式。但是，这种表面印象会因为以下这一事实而受到误解，即，分析哲学范畴中的语言概念认识本身是属于一个自足的整体，即使这个整体是由符号所构成的体系。与之不同的是，符号学从一开始就坚持，语言的符号活动，人类语言范畴中的符号行为，远非一个自足的话语世界。正好相反，根据符号学的看法，符号行为超越了人类对符号的使用所设定的边界，而且，除非在许多围绕语言运用的层次上和符号行为始终进行合作，并且以符号行为作为基础，同时使其能够成功地做到无论何时以及无论什么程度上的真正成功（当然，一直都成功是远远做不到的），否则人类的符号使用甚至毫无可能。⁴

的确，在符号学范畴中，众说纷纭的问题不是符号行为是否比任何对语言的理解都更为宽泛，而更多地是符号行为的范式延伸到多远。到目前为止，人们公认，符号行为，或“符号活动”（semiosis），至少能够扩展到意识或认知发生之处，这包括了动物的符号使用，或“动物符号活动”（zoösemiosis），这整个的领域。这已经挫败了索绪尔在“符号的符号学模式”（the semiological model of sign）中所体现的那种主张，这种主张将符号研究作为现代唯心论的一种变体（唯心论是具有现代性特色的哲学学说，根据其观点，头脑仅仅知道头脑本身构成或制造的东西⁵）。在符号学范畴中的符号操作模式中，每个符号都存在于关联三个术语的关系之中，术语之一执行“再现他者”（other-representation）的载体功

⁴ 人类的符号使用通常被称为“人类符号活动”（anthroposemiosis），或者人类思想、情感和活动领域中的符号行为。“人类符号活动”这个术语，与希腊词根“心理”（“psyche”）的所有变体截然不同，含有“自我/自然相关”和“无意识力量”，唯有如此方能传达“人类符号活动形式与作为整体的符号学世界之间的关联感”，按照一种总体观确切地表示“人类秩序及其符号活动的独特形式”，对此，正如柯林顿（Corrington 2000： 86-7）所说，“符号活动是‘属’（genus），特定符号互动秩序是‘种’（species）”。让人有些诧异的是，在做出这番阐述过程中，柯林顿又表示，我们更应该使用“心理符号活动”

（psychosemiosis）来传达“带有人类符号活动形式和作为整体的符号世界关联感的、针对无意识的内心作用的某种戏剧性”。但是，在这里，他对“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的过分关注，含有（同上引）“某种受制于人类操作的东西，某种既是私人化的，又与精神分析师同精神分析对象那种二元关系相关的东西”，他想要对此进行“超越”，却让他踏入陷阱。因为表示“心理符号活动”对于心理分析是“自然的替代性术语”，并不能让我们通达目的。不仅“心理”这个词根对于我们的目标过于宽泛，即便在古代思想语境中也是如此（参 Deely 2001： 85n57）；而且，这个词根在现代语境中的讹误更导致误解不断。因为用“心理符号活动”来替代“心理分析”，自然包含了心理分析扎根其中的整体上的现代哲学的“身心二元论”（the mind-body dualism），这种意义内涵只有在我们试图把“心理活动”也作为属类处理的时候才须强调。毕竟，“心理”，无论其是否具有符号性质，对于描述某人身所展示出那种自然操作的融合与平衡而言，并非那种人们自发就会运用的方式。

⁵ 参见《四个时期》，第十六章。

能（皮尔斯据此称之为“再现体”[representamen]⁶），术语之二执行“再现自我”（self-representation）或“客体化”（objectification）功能（皮尔斯称之为“客体所指”[object signified]，这是一个有些冗余的表达，对此我们后边将谈及⁷），术语之三在表意活动本身范畴之中执行关联功能——即使当再现体或符号载体是自然事件的时候，譬如冒烟的火山，对此将会在后面论及——把再现体与其“意指”（significate）关联起来，由是，三者构成了一种三元关系，在此基础上，皮尔斯追随其拉丁前辈们的做法（他本人那些后继的现代追随者是难以承认这一点的）——他正是从这些拉丁前辈们那里认识到这一事实的——将所谓严格意义上的符号认同为一种三元关系。因此，皮尔斯正如他之前的拉丁前辈们所做的那样，尤其以普安索（Poinsot）为榜样，⁸对所谓宽泛意义上的符号（signs loosely so-called）和所谓严格意义上的符号（signs strictly so-called）进行了区分，前者在严格意义上是再现体，后者即三元关系本身，它如此这般地既不同于符号范畴中统一起来的三个术语中的任何一个，⁹又不同于符号关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个范畴中的诸多相关客体。

今日符号学中的“众说纷纭的问题”，¹⁰因此，不是 semiology 是否应该携手 semiotics，或者投入后者帐下的问题，而是符号学的边界是否比“动物符号学”（zoösemiotics）还要来得广阔的问题，并且，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两种立场。比较保守的立场是，试图把符号学扩展到包括动物和植物在内的整个生命之物。这种扩展 1981 年由马丁·克拉蓬（Martin Krampen）在“植物符号学”（phytosemiotics）这个特别标签下首次正式提出并加以探讨，“植物符号学”指对植物生命领域中的符号行为进行研究，这一主张很快受到人们的嘲弄，但是，

⁶ 正如我的学生们所知道的那样，皮尔斯派学人亲近英语而普遍忽视拉丁语，因此习惯性地错读这个单词。1992 年，我通过使用脚注（Deely 1992: 157n），发起了一场堂吉诃德式行动，试图纠正当代皮尔斯派学人对这个术语的错读，在这里我将继续下去。由于这是一个发音方面的问题，一种听觉有关的形式，而我在这里唯一的媒介是书写，我所做的努力无疑具有双重的堂吉诃德式行动性质。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做。术语“representamen”源自拉丁语，表示“再现”或“再现之物”，在语境中更确切的理解是“他物的再现”（other-representation），以区别于“自我的再现”（self-representation）。按照这种词源分析，这个术语不应该如亲英语的皮尔斯派学人那样读作“represént-a-men”，而应该读作“represen-tó-men”。

⁷ 参见本书第三章。

⁸ 普安索是确立以专门符号研究来探索主体统一性问题的第一位作家，参见他 1632 年的著作《符号学》（*Tractatus de Signis*），第一册，问题 1。（仅仅在一年之后，伽利略[Galileo]的冲击使得拉丁认识论敝然色变，而在之前的两个半世纪中，拉丁认识论一直是沿着符号学路线前进的。）

⁹ 参见本书第三部分。

¹⁰ 譬如，最近在德国(Nöth 2001)就“从自然到文化的符号学跨越”（The Semiotic Threshold from Nature to Culture）召开了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此主题作为符号学跨入新千年的紧迫性问题。

尽管我最初也跻身怀疑者之列，却最早对之采取捍卫行动。¹¹在符号行为以及由此而来的符号学范式能否被扩展到认知生命这一疆界之外这个问题上持保守观点的一派，汇聚在“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这一宽泛的标签下。¹²

更为激进的一派（皮尔斯本人必然算是其中巨擘）并不争论把植物符号学同动物符号学一道纳入生物符号学的问题，而是声称，即使是这种扩展仍然是有疏漏的，也就是说，围绕在生命之物周围、所有生物赖以生存的总体的物质性世界被排斥在外了。迄今为止，对于能够促生、维系生命的物质性世界发展的研究都是放在进化（evolution）这一框架之中。今日的符号学激进派争辩说，符号行为的特点，正在于以未来事件作为基础，来塑造当下，因此也是在其持续性之中来塑造过去。¹³基于这种考量，符号行为（或“符号活动”[semiosis]）即使在岩石之中，在群星之中，也能够得以辨识——这是一种可验证的“物质符号活动”（physiosemsiosis），对其的理论证明和实际探索标志着符号探索的最终边界，所谓“最终”，只是就由有限存在所构成的宇宙中已经没有任何有待符号活动探寻的所在而言，现在已经发现，（如果物质符号活动这个概念最终得到证明的话）只要是有限存在相互作用的地方，它都无处不在，这样，皮尔斯关于宇宙是一个整体的说法于是得到了证实，即便它并不仅仅只是由符号构成，也还是处处符号充斥。

在保守的生物符号学家与相信皮尔斯关于有限存在为符号活动所充斥这一基础性直觉认识正确的激进派人士之间，“研究语言的哲学家”已经在知识竞赛中尘埃落定，受到抛弃，事实上，这场知识竞赛带领哲学本身超越了现代性和以现代性作为其一个独特哲学时期的身份那种知识范式。

且让我们对这种状况做出思考，因为，没有关于哲学中现代性的清晰理念，为后现代性这个标签有无意义而争执不休将是毫无裨益的。

¹¹ 参见：Krampen 1981; Deely 1982b. 另见：Deely, Williams, and Kruse 1986: 83–103.

¹² 《符号学》（*Semiotica*）这门杂志以整期篇幅为此论题出了三期：Vol. 120–3/4 (1998)是对霍夫梅尔（Hoffmeyer）1996年著作的十三篇评论及其所做的反驳；Vol. 127–1/4 (1999)是名为“生物符号学”的专号；Vol. 134–1/4 (2001)是由卡莱维·库尔（Kalevi Kull）任特约编辑的关于雅克布·冯·尤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üll）的专号。关于对此的综述，参见 Sebeok 2001: 31–43.

¹³ 参见本书第三部分中相关讨论。